

“我选艺术作自己的国家”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

她生在华盛顿,但却能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她热爱舞蹈,却无法在中文和舞蹈中二选一;她说自己要选 A and B,而不是 A or B,让她实现这个理想的地方,正是在中国。

刚刚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方美昂女士穿一袭红裙坐在记者面前,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不好意思我时差还没有倒回来,普通话可能说得更烂。”显然她不仅学到了中国的普通话,还学到了中国文化中的自谦。

事实上她的普通话说不仅说得很好,而且说得很快。这位布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热爱的东西有两样——中文和舞蹈。她寻寻觅觅地试图将二者结合,而现在她终于找到了。她创办了一家名为“乒乓”的策划公司,名片上印着这样一句话:用表演艺术架起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桥梁。

很少有人用“乒乓”二字来命名一家公司。问她原因,方美昂莞尔一笑,清晰准确地回答说:“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们做文化外交。”“乒乓”中英文发音一样,在国外大家一听到“乒乓”就会想到中国,乒乓球打起来本来就是一来一往,所以就取这个名字。”

我选 and 不选 or

方美昂英文名为 Alison M. Friedman,她出生在华盛顿一个普通中产家庭。当时华盛顿大部分的中学提供的外语课程有两种——西班牙语和法语,方美昂刚开始也是学了西班牙语。

“但西班牙语和英语很像,很简单,没有意思。”升入高中后,她发现自己的新高中竟然提供中文课程。“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开始学中文,跟中文打交道,没想到改变了我的一生。”

方美昂打了个比方说,自己从小开始似乎就在登一座大山。她始终在路上,不知道自己离顶峰还有多远,甚至连山顶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当她坐下来休息回看来路时,才发现一切原来早有安排。

“十几年前学汉语的时候没有想到现在会在北京生活工作,当时只是因为感兴趣。”

除了汉语之外,方美昂从小对音乐、舞蹈也十分感兴趣。小时候学钢琴,十几岁开始学习踢踏舞,高中进入华盛顿青年踢踏舞团,经常参加各类演出。

现在想来,方美昂明白自己小时候对于艺术和外语感兴趣其实是一回事,“都是一种语言,一种交流,演员和观众交流。我慢慢发现其实我的两个爱好其实是一个,就是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考上布朗大学之后,她发现自己中文班的同学们几乎都是经济专业的,大部分是为了去中国“淘金”。“他们对艺术不感兴趣。我感到迷惘,我喜欢戏剧舞蹈,但我的同学是另一个门类的,他们要去上海或香港做生意。我不知道我的

“不是选 A or B,我选 A and B。父母让我选中美,我不选;很多人让我找大使馆或者外教的工作,我不要选,我是世界公民。我选艺术作为自己的国家。”



中文和舞蹈要怎么结合。”

2012年,乒乓策划将马克·莫里斯舞蹈团引进中国,在广州大剧院首演。著名指挥家马克·莫里斯担任整场演出的编导,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的舞团就全部采用现场交响乐团进行演出。

莫里斯是方美昂的偶像。“不仅因为演出十分精彩,也是因为莫里斯编导和指挥家两个都做。不是选 A or B,我选 A and B。父母让我选中美,我不选;很多人让我找大使馆或者外教的工作,我不要选,我是世界公民。我选艺术作为自己的国家。”

我在北京找到了“家人”

2000年,方美昂参加了布朗大学的一个交换项目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哈尔滨待了3个多月的时间。她回忆说那是一段愉快的时光,但当时在哈尔滨的外国人还很少,自己还是常常觉得孤独。

“留学回国之后,我还是很迷惘。生活要怎么办,花了那么多多年学舞蹈、中文,但是没有用。毕业之后要改行,怎么办呢?”

她苦恼地和朋友商量,该如何结合中文和舞蹈,最后觉得做记者或许能好一些。2001年,她重返中国,在 CNN 做实习记者。

偶然间方美昂通过朋友认识了“生活舞蹈工

作室”的创办人文慧和吴文光,当时他们正在排一个名叫《与民工一起跳舞》的新舞。当时北京刚刚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文慧和吴文光觉得艺术家和民工都是用身体生存的人,却几乎没有任何碰撞,希望用一场演出纪念这个历史时刻。

他们请到了 30 位四川民工参与排演,方美昂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排演一周之后,这台演出在一个工厂场地上演。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找到了亲人,一开始排练,所有的距离消失了。舞蹈帮我在北京交到了一帮好朋友。我知道自己找到了一条路。终于知道中文专业和舞蹈爱好不用永远分开,终于找到方向将他们结合。”

关于“现在舞”

之后方美昂申请了富布莱克奖学金,她有一年的时间在中国研究舞蹈、特别是现代舞的发展现状,课题研究先后在北京舞蹈学院和北京大学进行。方美昂说,似乎自己知道得越多,不知道的也变越多。研究项目结束之后父母催促她回美国,她却决定在中国留下来,去更深入了解自己好奇的一切。

2003年,她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 DJ 的工作,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可以和各个

地方、行业的普通人交流,同时也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可以让她继续做关于舞蹈的事情。

因为没有受过正规的舞蹈训练,考取专业舞团对她来说不太现实。而就在这时,有越来越多的关于中美文化交流的项目请她担任项目协调人。2005年,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举办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中国文化节,与中国文化部合作,方美昂担任制作协调人,频繁来往于中美之间。

“不是我去找机会,而是机会来找我。当时一个月内在美国的几百场演出场场爆满,都是美国老百姓,这让我很高兴。我在中国待了3年,知道中国人对美国感兴趣,却一直很担心美国人怎么对中国感兴趣。表演艺术能让对方国家看到本国多样化的方面。”

方美昂说尽管自认是世界公民,但自己也是“井底之蛙”。“这不可避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家庭背景,可能一直会是井底之蛙,但可以去别的井里生活一下。可能最后会回到自己的井,但是你体验过不同的井,所以会有不同的感受。”

相较纽约城 300 个现代舞团的数量,中国目前注册运营的只有不到 10 家。改制之后,进入市场化运营的剧院也不愿意冒险进行现代舞演出。加上很多观众说许多现代舞让自己“看不懂”,这让许多艺术家举步维艰。

在美国是以时间段来区分现代舞和当代舞,中国则更多的是以风格来分。方美昂十分欣赏陶身体剧场创始人陶冶的理论:没有什么当代现代之分,就是“现在舞”,是 now。

如果说古典舞蹈是对观众讲形象的故事,那现代舞就是关于抽象情绪的表述。方美昂说观众其实没有必要执著于创作者到底表达了什么,重点应当是观看表演时你联想到了什么,再去思考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些,然后自然就知道创作者表演得好不好了。

“全世界艺术家的可能都一样,就是没钱。”方美昂说国内剧院有着票房的压力,老板们更喜欢开流行歌星的演唱会。“但如果如果不注意培养观众的话,怎么能赚到钱呢?”她说有的剧院用一部分钱来反哺舞台剧、现代舞等形式较新的艺术品类,培养观众,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在中国待了十几年,面对别人对她 say no,她也有了自己的一套逻辑:“我有一个办法,问四次。第一次问他们的答复是‘没办法’,第二次是‘太麻烦’,第三次是‘一会儿再说’,第四次是 Ok Ok Ok。但如果你问第一次他就说没问题,完蛋了——有问题可以解决,没问题我们要怎么办?”

乒乓策划为中国观众带来的新作,是 6 月即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绝密:五角大楼文件之战》,该剧由洛杉矶剧院制作,演员阵容中更是有许多中国观众熟悉的美剧演员。

Voice 见微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年轻人有朝气,社会就有朝气;年轻人有光明的前途可奔,社会的未来就一片大好。扫除笼罩在社会上、徘徊在青年人心头的暮气,需要社会对他们敞开更多的机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间。”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80后”缺乏朝气,提出似乎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文章同时说道,“早衰”的年轻人,有时会显得和“成熟”很像,举手投足都无比正确。但同时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此文一出,引发了各方热烈讨论。

“因为复旦大学投毒案后,学校有所戒备,学校也害怕,万一有人投毒呢!”

——哈尔滨某高校宿舍楼,近日禁止桶装水进入,该校一管理员解释原因是觉得桶装水“太危险”,作为一所医科类院校,实验室里有各种化学药品和药品。

“最近,我可能会见到一位管理互联网的领导,微博上朋友们有什么建议要转告?”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微博公开征集意见建议。

“未来就是病毒与杀毒软件。”

——在优酷与“新周刊话题社”联合举办的《黑镜》研讨会上,延参法师如是说。

“上个礼拜就在我们楼下的会议室,中国工信部牵头成立了 MG2020 推进组,正式启动了国家 5G 标准化的研究工作……5G 的产业一定要抢占先机。”

——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2013 年 ICT 深度观察大型报告会”上,电信研究院通信专家万屹透露,工信部牵头成立了 MG2020 推进组,正式启动中国 5G 标准化研究工作。三星电子 5 月 12 日称,它首次成功地开发出了第五代网络的核心技术,这种新的无线技术将能够让用户访问比目前的第四代网络速度更快的数据流,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下载一部完整的电影。

“国产电影的发展,怕的不是外行、骗子、混混,市场会淘汰他们。怕的是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流氓,他们经常篡改影片里不存在的东西上纲上线,他们认为所有影片都应该体现那些过时的政治教化理念,他们往往直接以内幕情况反映上书有关部门,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总能达到想要的封杀禁止批评等目的。”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评中国电影发展。

“计划体制形成于 1958 年,至 1978 年改革不过 20 年时间,而改革已有 30 多年时间了,居然对这个体制还改不动。原因何在?有许多大词把这个体制包裹起来,使得核心部分改不动。这个核心部分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维持利益的是权力。”

——在 5 月 11 日召开的吴敬琏文集讨论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发表了上述看法。

“苹果公司或为获取市场份额推出利润率较低的‘廉价版’iPhone,而该产品将拖累苹果的整体利润率。”

——美国投资机构 Piper Jaffray 分析师吉恩·蒙斯特认为,由于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苹果公司利润率将在两年内降至 34%。一年前苹果的利润率为 47.4%,而上季度则降至 37.5%。

“您好!对于我行系统问题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现在我行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此事我们也在继续排查中,有进一步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公布。再次表示抱歉!”

——5 月 12 日 10 时许,网友反映招商银行全系统瘫痪。一时间,来自全球的抱怨让招商银行微博账号不停地回复上面这条信息。

“在采访时,彭博社的记者询问一位高管,有关某个合伙人是否于近期离职了——因为此人很久没有登录使用他的彭博机了。”

——继《世界新闻报》之后,彭博社也被曝出监控金融客户的丑闻。《纽约邮报》近日报道,在得知彭博商业新闻记者使用该公司生产的彭博机监控在华尔街银行工作的员工之后,高盛对彭博进行了质询。据介绍,每台彭博机一年的租金大约是 2 万美元,其中还包含实时数据服务,从金融交易到体育和严肃新闻应有尽有。彭博社发言人表示将马上“决定停止记者调用客户关系数据资料”。

从「国际章」到「YES 小姐」



亚利山大·库马尔博士将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白色火星”——地球上最冷、最黑暗的南极洲中心地区,室外气温跌破 -80℃,有风寒时跌破 -99.9℃。库马尔博士是在肯尼迪站的欧洲团队 13 人中唯一的英国人,他正试图弄清人类太空航行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尤其是极端封闭的影响。这段在考察站的生活以及封闭经历,可能成为载人火星任务的先驱。

鉴于 NASA 已成功地将其最大机器人在火星着陆,人类何时登陆火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研究者正试图弄清,要使该任务成功需要哪些因素。

在肯尼迪站,库马尔博士负责评估、记录,并在必要时治疗团队成员任何精神或身体上的疾病。他必须考虑到突发情况,准备应对任何问题,并在情况发生时就地解决。

“除了作为在站医生,我还为欧洲太空总署的载人航天计划进行研究工作,考察生活在这种极端封闭环境下的生理与心理影响。我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我们能将人送至多远,尤其是考虑到极端生理和心理状态。这项工作也许有一天能有助于塑造载人火星计划,并且,更重要的是,看到其安全返航。”

库马尔杜撰了一个新词“肯尼迪星球(Planet Concordia)”来形容 7 个月待在极地的感觉,因为这实在是和在另一个星球没有区别。尽管南极与火星极地的表面重力和大气压有显著差别,但火星表面的平均温度为 -55℃,却与肯尼迪的极端外部低温十分相近。

得益于现代通讯科技的发展,越冬队员可以通过网络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库马尔博士却出乎意料地说自己经常羡慕早期极地探险家交流的匮乏。

“消息被空投到考察站,有时会像炸弹一样爆炸。情感没法宣泄——这儿是你思想的囚室。”

罗曼·查尔是“火星 500”实验的成员之一,他在封闭环境下生活了 502 天,以模拟一次火星任务。他与库马尔讨论说,不会有诸如前往火星的单程发射任务,对于前往火星的航行,宇航员一定有最终返回地球的计划,即使希望渺茫,也必须存在,这样才能保证理智正常。

库马尔将越冬比作是疏浚自己思想的洋底。“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不过必须保持信心,知道你能应对任何事。”

(苏澈)

Face 面孔



『要么悲伤,要么有趣』

纪录片拍摄者和纪实照片摄影师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让被摄者在镜头前保持真实面貌。通行的做法有两种,一是通过引导,让被摄者习惯摄影机或者照相机的存在,还原生活的本来样貌;二是直接进入,记录下当事人的第一反应。

这两种做法孰优孰难以判断,前者看似接近真实,但熟悉镜头之后大部分被摄者会产生“表演欲”,后者得到的作品往往具备极强的冲击力,但总会有莽撞无礼之嫌,大部分人对于突然冲进他们生活的人可是没有什么好脸色。

玛丽·艾伦·马克在孟买红灯区福克兰路就经历了这样的试炼。这是一条以妓院闻名的街道,到处站着妓女、皮条客和变性人,旁边的房屋就是他们的营业场所。1968 年马克第一次来到福克兰路就被深深吸引,但在她试图拍张照片的时候,妓女们会朝她泼脏水,男人则会攻击她,同时她也要警惕成为扒手的目标。

10 年后再次来到孟买的马克依然被福克兰路中所充斥的巨大情感力量所吸引,她在大街上来来来回回,妓女们依然向她抛掷垃圾和污水,但她却始终没有离开。

如同预想的好结果一样,马克开始和妓女、变性人交朋友,之后老鸨们开始允许她进入房间拍摄。她拍摄散发魅惑眼神的裸体妓女,也拍摄她们和衣躺在床上休息的片刻。小麦色的皮肤、脏乱的环境,以及艳丽的床单,交织出了强大且平静的情感力量。

马克拍照的方式是直接介入但不给拍摄者施加主题影响。“我会马上就开始拍摄,否则,你会在主体的关系中歪曲自己的角色,你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拍照。”她镜头下的大部分人没有笑容,直截了当地展现着对于镜头的陌生感。“我通常不喜欢人们对着相机微笑。的确,有时候他们笑起来很美。但笑容常常是一种防御,他们并不舒服。如果有人是装出来的笑容,我会告诉他们不要笑。”

有人评价说在马克镜头中的人,不论是处在工作场合还是私人空间,都带有某种另类色彩,因为他们置身于主流之外。

马克曾说:“我被那些尚未在社会中有立足之地的人所吸引,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用摄影确认他们的存在。”

(北纬)

时空中最孤单的工作

亚利山大·库马尔博士将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白色火星”——地球上最冷、最黑暗的南极洲中心地区,室外气温跌破 -80℃,有风寒时跌破 -99.9℃。库马尔博士是在肯尼迪站的欧洲团队 13 人中唯一的英国人,他正试图弄清人类太空航行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尤其是极端封闭的影响。这段在考察站的生活以及封闭经历,可能成为载人火星任务的先驱。

鉴于 NASA 已成功地将其最大机器人在火星着陆,人类何时登陆火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研究者正试图弄清,要使该任务成功需要哪些因素。

在肯尼迪站,库马尔博士负责评估、记录,并在必要时治疗团队成员任何精神或身体上的疾病。他必须考虑到突发情况,准备应对任何问题,并在情况发生时就地解决。

“除了作为在站医生,我还为欧洲太空总署的载人航天计划进行研究工作,考察生活在这种极端封闭环境下的生理与心理影响。我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我们能将人送至多远,尤其是考虑到极端生理和心理状态。这项工作也许有一天能有助于塑造载人火星计划,并且,更重要的是,看到其安全返航。”

库马尔杜撰了一个新词“肯尼迪星球(Planet Concordia)”来形容 7 个月待在极地的感觉,因为这实在是和在另一个星球没有区别。尽管南极与火星极地的表面重力和大气压有显著差别,但火星表面的平均温度为 -55℃,却与肯尼迪的极端外部低温十分相近。

得益于现代通讯科技的发展,越冬队员可以通过网络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库马尔博士却出乎意料地说自己经常羡慕早期极地探险家交流的匮乏。

“消息被空投到考察站,有时会像炸弹一样爆炸。情感没法宣泄——这儿是你思想的囚室。”

罗曼·查尔是“火星 500”实验的成员之一,他在封闭环境下生活了 502 天,以模拟一次火星任务。他与库马尔讨论说,不会有诸如前往火星的单程发射任务,对于前往火星的航行,宇航员一定有最终返回地球的计划,即使希望渺茫,也必须存在,这样才能保证理智正常。

库马尔将越冬比作是疏浚自己思想的洋底。“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不过必须保持信心,知道你能应对任何事。”

(苏澈)

